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Scientists Who Returned
from Study in the U.S. in the 1950s*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侯祥麟 罗沛霖 师昌绪等 / 口述

王德禄 杜开昔 / 访问
王德禄 高颖 程宏等 / 整理

CS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Scientists Who Returned from Study
in the US in the 1950s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50 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侯祥麟, 罗沛霖, 师昌绪等
口述.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4
(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ISBN 978 - 7 - 5539 - 0464 - 1

I. ①1… II. ①侯… ②罗… ③师… III. ①科学家
—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4340 号

书 名	1950 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作 者	侯祥麟 罗沛霖 师昌绪等口述 王德禄 杜开昔/访问 王德禄 高颖 程宏等/整理
责任编辑	阮 林
责任校对	鲍艳玲 周 晔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 - 85486742 QQ 2284117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印 张	29.75
字 数	450 000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39 - 0464 - 1
定 价	78.00 元

主编的话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 20 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 20 世纪。自 1895 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 20 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



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 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 80 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 2006 年启动了《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 20 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把记忆于头脑中的信息提取出来，方法上有口述与笔述之差别，但就获取的内容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本丛书当前在积极组织从事口述史采访队伍的同时，也积极动员资深科学家撰写回忆文本，

作为“笔述系列”纳入到本丛书中来。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

本丛书根据迄今践行的实际情况，在大致统一编辑规范的基础上，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 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 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3. 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
4. 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 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文本重新编译出版。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整理者，同为口述史成品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注重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



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按名家唐德刚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的说法，口述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历史争议，如果不能在访谈过程中得以澄清或解决，可由访问者视需要而酌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若对某些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并可酌情做必要的说明或考证。因此，读者不必视为定论，可以质疑、辨伪和提出新的史料证据。

本丛书将认真遵循求真原则和史学规范，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搜求各种亲历回忆类史料，推动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欢迎各界朋友供稿或提供组稿线索，诚望识者的批评指教。谨以此序告白于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樊洪业

2011 年元月于中关村

范岱年序

我与王德禄和杜开昔早在 1980 年代就认识了。那时，王德禄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任编辑。杜开昔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科学史家，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英语客座教师。他们两人都对留美回国科学家的历史感兴趣，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开启了“20 世纪 50 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的研究课题。遗憾的是这个课题在完成基础工作后，因为杜开昔离开中国、王德禄下海而夭折了。这个课题能在 20 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启动，与王作跃教授有很大关系。王作跃是许良英教授和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现在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任教授。他在美国申请了一个有关留美华裔科学家的课题。我向他提到了王德禄和杜开昔当年的工作。王作跃为此特地找了王德禄。这就促使他又重新拾起这个课题。最近几年，王作跃经常到中国，我和王德禄、王作跃也经常就这个主题交流意见。当这本书经初步整理完成第一稿时，我通读了一遍。因为整理者不熟悉当时的人物，仅凭读音写出来的人名往往误差很大，我就做了很多订正。有的我也不熟悉，就再向别的朋友打听，为此还打了不少电话，也翻阅了不少资料。王作跃回国做调研时，我和他一起采访了留美回国科学家刘静宜、顾以健，在美国华盛顿 DC，我和王作跃、王德禄一起采访了现在美国定居的当年留美回国科学家俞惟乐（她是在“文革”中自尽的科学家陈绍澧的夫人），我也向王作跃介绍了我认识的许多留在美国的



华裔科学家。

王德禄和王作跃关于留美华裔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也是我关注的一个领域。2011年7月25—29日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会上专门举行了“留学西方的中国科学家：冷战中的跨国科学与政治”分会。王德禄和王作跃向会议提交了有关留美华裔科学家的报告，分会由我主持并做评论。为了准备这个评论，我回顾了我一生所见过的许多留美科学家。他们大致可分为5代：第一代是祖父辈，如医学家陈光甫；第二代是老师和父辈，如竺可桢、束星北、卢鹤绂；第三代是同学和兄弟辈，如杨忠道、周元桑、范乐年；第四代是学生、子侄辈，如周郁、庄小威、姚佩兰；第五代是学生、子侄的孩子辈。本课题采访的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应该属于第二代和第三代。

我读了这本访谈录，深感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首先，这部访谈录，开始于1980年代，这种口述史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具有开创性。虽然收录的访谈对象只有31位，但涉及的留美科学家不下数百人。访谈录叙述了受访者出国前后的情况，在美国争取回国的经过，回国后的工作情况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受访者大多已经逝世，少数在世者现在都已年迈体衰，也很难再接受访谈了，使得这些资料尤为珍贵。整理者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背景资料，为数百位留美科学家做了注释和简介，积累了整理口述史的宝贵经验。

读了访谈录，我深深地为这些科学家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而痛心。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应该牢记这些惨痛的教训，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和法治，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不让“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悲剧和暴行重演。这样做，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

王德禄的这本访谈录，访谈的对象限定为 1950 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其实，在 1950 年代以前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中，有许多是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现代国防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仍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些科学家在世者已屈指可数，访谈本人已没有可能了，但我们还可以访谈他们的子女、学生，抢救史料。王德禄原来访谈过的孟昭英、傅承义、褚圣麟、袁翰青、卢鹤绂（他是我的老师）都是 1950 年代前回国的留美科学家，彭桓武是留英的科学家，我看过这些访谈录，觉得极其珍贵，本书没有收录，我深感遗憾，希望能够在别处尽快发表。至于 1950 年代以后没有回国的留美华裔科学家，人数比归国的要多得多。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末，从台湾、香港有大批华人留学美国，他们中也有很多人留在美国。祖国改革开放后，又有大批学生和学者留学美国，在 1989 年后，有很多人 also 定居在美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科学技术最先进、工农业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地位，大批美籍华裔科学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留美华裔科学家，大都有强烈的热爱祖国的感情，在中美恢复交往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通过回国讲学，合作研究，建立研究所，介绍中国学生及学者到美国留学、研究、访问等，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国科学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大破坏以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贵的帮助。所以，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王作跃已经开始紧张地工作了。王德禄通过近年来关于硅谷与中关村的研究，发现留美华裔科学家是联结这两个高科技开发区的主要人脉，所以这也是对留美华裔科学家的研究的继续。我虽对留美华裔科学家这一课题很感兴趣，

但已经年过八旬，垂垂老矣，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配合了。

从本书可以看出，当年不怕艰险，想尽办法争取回国的留美科学家，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后又到美国定居了，有的把他们的子女甚至孙儿都送到美国留学，让他们在美国定居、工作。现在，留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已经多于回国服务的留美科学家了。我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家共有兄弟姐妹 11 人，有 6 人入了美国籍，2 人拿了美国绿卡。我们的下一代，即我的子侄辈，共有 23 人，其中有 16 人是美国籍，1 人拿美国绿卡，加上他们的配偶，人数就更多了，他们大多是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孙辈是美国籍的就更多。我估计，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不在少数。因此，提倡研究华裔留美科学家，我有一个潜在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些留美华裔科学家和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要忘了共同的来自中国的“根”，要努力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万世开太平”。要竭力防止中美两国在一些霸权主义者、黠武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者的误导下，因为一些利益的冲突或认识的分歧发生战争，出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可悲场景。“战争无赢家”，战争只能给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中美两国的炎黄子孙，我爱你们（我爱大洋彼岸的亲人，也爱祖国勤劳善良的同胞），但是，你们可要警惕啊！

范岱年

2011 年 11 月 6 日于北京中关村

范岱年（1926—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主编，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引言

一、本书的缘起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学术兴趣是在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现代科学史方面，正值那段“文化热”的阳春季节，学术交流活动很多。1986年11月15—19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于广州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结识了在华工作的美国学者杜开昔（Kathleen G. Dugan）女士，她对美国的同行评议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和她做了很多次交流。当时她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英语，教学之余，很想借在华工作之便，对中西科技文化交流问题做些深入了解和考察。她提议与我合作，拟了个“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当时，我们想把这个课题的重点放在对科学家的访谈上。

1950年代归国的科学家当时大部分都在世，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恢复和提高当中。如何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而在较短时期内完成高密度的访问呢？有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李佩先生的支持。李佩早年曾投身国际妇运和工运，后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郭永怀先生结婚，并与留美学人有广泛的交往。1957年归国后，她先是倾力于中关村初创时期的公益事业建设，后来投身于中国科技大学的英语教学和组织工作。她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负责组织英语教学，和杜开昔较熟。李佩先



生的传奇性经历、对公益事务的热心和真诚，使她成为老一辈归国学人中口碑极好的热心人物。其实，杜开昔之所以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也主要是受李佩的影响。我们当时都住在中关村，受访对象也多半住在中关村及其周边地区。有老人家热心为我们穿针引线、搭桥铺路，事情就好办多了。

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吧，于 1988 年秋天起步，前期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一鼓作气依次访问了谈镐生、梅祖彦、彭桓武、林兰英、王守武、师昌绪、李恒德、赵忠尧、许国志、王明贞、徐亦庄、孟昭英、徐璋本、吴仲华和李敏华夫妇、谢毓章、褚圣麟、虞福春和田曰灵夫妇、王天眷、杜连耀。1989 年杜开昔离开了中国，我坚持继续工作，在北京采访了刘源张、傅承义、侯祥麟、黄茂光、申葆诚、罗沛霖、姜圣阶、陈能宽、疏松桂、颜鸣皋、袁翰青、唐有祺、李嘉尧等。北京之外，我专程去杭州采访了王启东；去上海采访了卢鹤绂、谢希德；去天津采访了余国琮、何国柱、陈荣悌以及何炳林和陈茹玉夫妇。

这个阶段对留美科学家的采访是我 1980 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十分庆幸有机会接近这些科学家，聆听他们留学美国及其回国后的经历。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到 90 年代的实践理性深深地影响了我个人的命运。1993 年我下海了，再也无暇做进一步的访谈，随之也放弃了原有的研究计划。当时内心深处有一种责任感，我把全部录音盒带做了仔细登记，一共有 105 盘，装在一个四厘卡片盒里，交给了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史征集和研究工作的樊洪业先生，请他全权负责处理。

往事已然沉寂，未曾想 2010 年又有机会重续前缘。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王作跃教授在美国申请了一个与 1950 年代

留美归国科学家相关的课题。当他得知我在 20 多年前曾经采访过一批留美科学家时，即请范岱年先生转告我，想看一看这些材料。由于年代久远，不知道这些材料是否还在，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与樊先生联系。两天后，樊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已经查到，全部完好无损，我即赶到中关村他的办公室。带回来后，看着这些录音带，勾起了许多往事回忆，捧着自己当年的这些宝贝，着实激动了一番，同时心中也顿然起了“弃题”重拾的冲动：把它整理出来，公之于世！我之所以想“弃题”重拾是因为 2007 年我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我尽量不参加研究所的日常运作，只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此，樊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这时正在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希望我能利用这些资料形成一本书，纳入到这套丛书之中。

二、1950 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当年面对访问对象时，我更偏爱于提出“科学与政治”的话题，杜开昔则往往对中西文化差异和女性科学家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总的说来，我们的提问，还是集中在按历史时代循序关联的三个时段上，一是出国前的个人情况，二是出国留学及归国的经历，三是归国后的工作情况和政治遭遇。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独特的“故事”，综合起来，又可以看出群体的一般特征，这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为了使读者更深入了解 1950 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群体经历的时代背景，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不同阶段有关政策演变的梗概。



1. 自抗战后期开始的留美高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拟具整个方案为要”。教育部随后制定了《留学教育方案——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教育部在1943年年底举行了第一次自费留学生考试，1944年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有各种名目的留学教育途径可供青年学子选择，政府也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当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资助或鼓励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让他们通过国民政府的正式通道出国留学。在这种形势下，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美高潮戛然而止。这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科学与工程者约占80%。

关于留学生人数，我们是根据中美两个官方文件估计的。美国的文件中提到，截止到1954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共5400人。1954年日内瓦谈判第204号文件（1954年5月31日，华盛顿）中提道：“……现在在我们看来目前在美國的5400名中國學生中想回到中國大陸去的不會超過一打人

……”^①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题为《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其中说“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②。

2. 冷战初期中美两国政府的留美学生政策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恰巧此时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对待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政策很明确，这就是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在匹兹堡大学召开成立大会，50多名各地代表出席了会议。该组织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宗旨，并发行了刊物《留美科协通讯》。

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③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并先后在

① 见李恒德《不屈的斗争 自豪的胜利》，引自《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72页。

② 《周恩来传（1898—1976）》（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1077页。

③ 于杰，《海外赤子》第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月。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而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政策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则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起初，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同意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日益加深，美国政府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这样在 1950 年代初有近 1000 名中国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大陆。当时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留美科协于 1950 年 9 月 19 日宣告解散。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待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态度逐渐明朗，这就是禁止他们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比如钱学森、颜鸣皋、黄葆同、毛汉礼、朱廷儒、杜连耀），有人被搜查。其中钱学森的案子十分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明显反映了麦卡锡时代的特点。到了 1951 年 10 月 9 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布法令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并向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了司法文书。

随着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又活跃起来，他们曾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公开化。此外，他们还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以及美国朋友寻求帮助，甚至给爱因斯坦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